

第七章 孕育川剧的背景条件

周企旭

《川剧百年史》第三编 川剧剧种的孕育与形成（一）

—

四川戏曲的流变动向以及演进的速度和进度，取决于四川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既定条件和发展水平。一方面要受到整个中国以及四川周边社会环境的影响，另方面又由于地理原因，总是保持着相对不同的特殊性。

大量历史文献证明，川剧剧种的孕育与形成，以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大背景的转换为前提，发生在清王朝行将就木而中国国体走向“共和”的新旧交替之际。

19 世纪中叶鸦片战争的爆发，标志着中国从封建一统的古代社会被推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社会；标志着长期处于“渐变”状态的中国自然经济急遽解体而被纳入世界近代工业社会经济体系的“突变”时期的到来；同时也标志着东、西方思想文化相互碰撞、相互对话、相互交融的崭新时代的开始。

实际上，鸦片战争前夕，中国已经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一方面，中国面临的敌人不再是古代的“夷蛮之敌”，而是进入工业社会并空前强大的带着血腥味的西方殖民主义；另一方面，统治中国这块土地的，是已经腐朽没落的封建王朝。

这种中、西对弈的新格局及其必然结果，如同马克思所预言：“一个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援，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的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鸦片贸易史（一）》）。

鸦片战争对于中国的深刻影响也正如马克思所论：“满族王朝的声威，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战前，中国政治上是一个独立自主而统一的国家。战后，中国领土开始被割裂，

主权遭到严重侵害而逐渐丧失了独立自主的能力；战前，中国经济上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农村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战后，西方列强不断向中国倾销商品并掠夺生产原料，迅速破坏了中国的农耕经济基础。被纳入殖民主义体系的封建中国，日益成为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附庸；鸦片战争的震撼，同时也激发不甘屈辱的广大中国人民的日渐觉醒和反思，并在反帝反封建的旗帜下振作起来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在思想文化领域，一批批觉醒的爱国志士创建“新学”，借鉴“西学”，呼吁“维新”，鼓吹“变法”，倡导“改良”，他们忧国忧民，前仆后继，悲壮而沉重地迈开了探索中华民族民富国强之路的新步伐。从此，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封建文化不断受到挑战和冲击，中国传统封建思想文化的统治地位，也开始从根本上发生了动摇。

从鸦片战争开始，整个中国的社会性质和基本矛盾发生了变化；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背景条件发生了变化；中华民族的生存环境、生存状态和生命意识也随之也发生了变化。所有这些变化，都属于历史性、根本性的社会质的变化。可是，此时偏隅西南腹地而和平稳定的四川，与中国东南部沿海、沿江地区急遽变化形势并不同步。从总体上看，相对不同的背景条件及其特点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政治经济方面滞后，二是思想文化方面落伍，三是戏曲戏班更加活跃。

一、滞后的四川政治经济

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是一个由东渐西逐步扩展而被动应变的历史过程。由于四川的地域封闭性、经济内向性、文化保守性等已经自成一体，四川半殖民化半封建化的进程比中国东南省份迟缓了三四十年。

由于接连两次鸦片战争的硝烟都未曾笼罩四川，四川境内的农耕经济也未象明末清初那样连年不断地遭受战乱、天灾、瘟疫及虎患的严重破坏，所以至道光三十年（1850年），清王朝虽已明显呈现衰势，但长久偏安于西南腹地

的四川，不仅人口数量超过江苏而跃居全国之首，而且经济也一直稳步地得到发展而保持着逐年递增的势头。据统计，从鸦片战争开始的 1840 年至 1911 年 70 年间，四川人口数量从 2,600 万一直增加至 4,344 万，始终保持着领先全国的地位。虽然人口密度的加大造成了人均耕地和粮食占有量的日渐减少，人民群众的生活负担日益加重，但由于四川不是帝国主义侵华战争和太平天国战争的主战场（1863 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虽曾率兵入川欲攻成都，但却被清营诱捕就义）社会相对还是比较稳定。光绪初年，四川省城成都一带的大多数民众，依旧蹒跚在中世纪的圈子里，沉睡于安享太平的惯性中。人们当时的自我感觉，正如民国时期《温江县志》所述：“城镇田庐，载筑载兴，鸡鸣狗吠，声闻四野，休养生息，浸及百年”。

四川正式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期是在 19 世纪末的光绪年间（1875—1908）。此时，腐朽的清王朝已经完全丧失了扭转战败、赔款、割地局势的能力，不得不继而同意开重庆为通商口岸，开巴县和万县为英、日商埠，并允许日本在巴县开辟租界。自 1891 年重庆开埠，外国资本主义打开了四川市场的大门，四川资本原始积累和与之相应的四川社会“近代化”进程才算真正开始。而这一进程，却是以对四川自然经济的破坏，以对四川人民特别是对广大农民、手工业者的掠夺，以对四川地区的中国主权如土地使用权、矿山开采权、铁路修筑权的攫取和四川社会的半殖民化为代价的。自此，洋人、洋行、洋旗由东渐西与日俱增，资本主义世界的洋货输入量越来越大，作为工业原料的四川土产资源输出也越来越多。

大量洋货充斥四川市场，迅速给四川社会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小农经济、作坊式手工业带来了催枯拉朽式的打击。如民国《达县志》十二卷载：“市镇大者皆有花店，自洋纱输入而纺棉业微”。民国《巴县志》十二卷称：巴县“四十年前纺花手摇车家皆有之，每过农村，轧轧之声不绝于耳，棉纱畅行，此事尽废”。民国《什邡县志》七卷也记：什邡“妇女纺绩缝织为普通职务，自洋纱西来而纺车声息”。不仅洋纱、洋布大量输入，而且洋油、洋纸、洋烟、洋伞、西药、甚至鸦片烟及其吸具等也很快渗入到四川民众的日常生活中。

资本主义世界的商品输入和帝国主义列强的经济掠夺，激起了四川人民的强烈不满，不少人认为：“海航通商，耶稣传教，夺小民农桑衣食之计，废大圣君臣父子之伦，以洋烟毒中土，以淫巧荡人心。自道光以迄于今，其焰愈强，其势愈暴”（民国《大足县志》）。同时，也引起知识界一些爱国志士的极大愤慨，时为《蜀学报》主笔的吴之英针对四川“利益于外”的时弊曾愤怒撰文指出：“蜀国于今已瘠土，官商犹自说天府”。

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光绪皇帝接受“变法自强”主张而谕行“新政”。虽然“戊戌变法”不过是惨遭实权在握的慈禧太后残酷镇压的“百日维新”，但在民族灾难深重而反抗斗争风起云涌的年代，日益高涨的反帝反封建大潮已势不可挡。1906 年 9 月，慈禧为了维持其风烛残年的独裁统治，不得不旨谕仿效欧美而准备实行日本式的“宪政”，先后担任四川总督的岑春煊、锡良、赵尔巽等，对于推行新政都十分卖力。清政府的改良派、立宪派主局之后，四川实行了废科举、兴学堂，办警察、练新军，振兴商务、奖励实业以及筹备地方自治、设立谘议机构以及移风易俗等一系列积极措施，其影响波及社会的农、工、商、学、兵各个方面，客观上为改变四川旧有的封建体制，促进四川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改变社会的陈腐风气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20 世纪之交，西方资本主义的输入以及清王朝“立宪”应变新政的在川实施，标志着四川已突破与世隔绝的闭关自守状态，汇入了世界近现代文明的进步潮流。英国驻重庆官员在《重庆海关十年报告》中也称：“1902—1910 年 10 年间，进步的潮流波及四川”。

早在 19 世纪初期，四川的社会经济中已萌生一些资本主义因素。如蚕丝、棉花、麻、烟、茶等农业经济作物的经营商品化，各类手工业生产的扩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手工业特别在井盐业里的出现，多层次区域性市场的初步形成等。可是，由于封建的土地私有制经济在比较封闭的四川业已盘根错节，加之清王朝政治上的极端专制主义以及经济上所采取的抑商、闭关和重税政策，四川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非常缓慢，其力量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汪洋大海里也显得十分微弱。因而即便四川实行“新政”以后，四川的资本积累比沿海、沿江省份仍晚了几十年。一方面，四川新兴资产阶级力量壮大的时间较迟、较短，成为巨富的相当少：“川省素乏巨万富商”（《渝报》第三册）。

对此，晚清积极推行实业维新的四川劝业道总办周孝怀也大为感慨：“若合四川绅商而论，不特无闽广数十百万之大贾，若即十万、二十万之巨富，通省亦不数姓”（《商务官报》第二十三册）。另一方面，由于新兴的资产阶级身上仍然残留着大量狭隘的地方封建习性，发了大财的富商们，积累的资金很少用于投资兴办近现代工业生产。即使是发了大财的一些工业资本家，也很少把资本投入于扩大再生产。例如自贡、富荣盐场的盐业大资本家，每年获利达几十万甚至上百万，而这些巨额资金，则多用来购买田地庄园。或者大肆挥霍浪费，动辄耗银钜万，使用于婚丧嫁娶、修祠垒坟等。因而四川的政治、经济，如与中国东南沿江、沿海地区的发展速度相较，仍处于滞后的状态。

二、落伍的四川思想文化

一方面是政治、经济形势变化的相对滞后，另一方面是比较封闭而又长治久安，这种特殊的际遇，使四川成为了十分适宜于传统封建思想文化传播和衍生的土壤。有关资料显示，在清代约有 270 年的封建统治过程中，四川考取进士近 800 人。光绪一朝凡 30 年，即有 180 人之多。四川科举“中试率高”，竟成为晚清四川蜚声全国的一大特点。然而这一特点的负面，也正是致使四川思想文化方面落伍于时代的一大痼疾。

很久以来，四川的思想文化界已存在一种“墙内开花墙外香”的现象：即少数胸怀大志、思想新锐的先锋人士，在川内普遍被人视为异己，或遭到打击排斥，或受到贬抑埋没。但其人其文一旦冲出夔门之后，却往往能崭露头角而弄潮于时代的前列。这种现象，在四川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晚清表现得尤为突出。

例如维新变法前后，随着“新学”的勃兴，四川思想文化界曾相继涌现出一批才华横溢、思想尖新并具有全国影响的中青年知识分子。如“戊戌变法六君子”中的杨锐（1857—1898，四川绵竹县人）、刘光第（1859—1898，四川富顺县人）以及吴之英（1857—1918，四川名山县人）、张澜（1872—

1955，四川南充人）、吴虞（1872—1949，四川新繁县人）、宋育仁（1875—1931，四川富顺县人）、蒲殿俊（1876—1934，四川广安县人）、罗纶（1876—1930，四川西充县人）、吴玉章（1878—1966，四川荣县人）等。他们大都曾就读于享誉全国的“成都尊经书院”（洋务派首领张之洞于1875年创办，1880年由著名经学家王闿运主持，1902年改名四川省高等学堂，即今四川大学前身）和去过日本留学，成为了维新变法、立宪新政乃至后来辛亥革命、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驱人物。

杨锐、刘光第等人入京求学和为官期间，曾深受康有为的影响，倍受光绪皇帝的赏识。不仅在“四川会馆”创建“蜀学会”倡扬“讲新学，开风气”，而且吸引了众多的学者、举人和拔贡（连清朝唯一的川籍状元骆成驥也去参加学习并深受影响）。虽然“百日维新”惨遭失败，杨锐、刘光第等被杀害，不少志士仁人受到贬黜，但在中国近代发展史上却留下难以磨灭的足迹。

可是，就四川境内的总体状况而言，毕竟地理位置远离京都而又比较闭塞，加之传统封建文化日久根深蒂固，所以直至四川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初期，不仅被中国东南部人士视为“见闻落后，风气难开”的边陲之地，而且一些回川或入川的有识之士，也深深感触到四川的思想文化氛围与时代格格不入。如川籍维新派人士宋育仁（1886年中进士，1894年出任驻英、法、意、比四国参赞，1896年被保举回川兴办商务、矿务并创办了四川最早的报刊《渝报》，1898年主持成都尊经书院并发起成立“蜀学会”和刊行《蜀学丛书》）曾撰文评论说：“蜀中山水僻远，一行省所督异郡县或不相闻，视外省、京师已辽矣。得风气为最晚，朝政知者稀”（《渝报》第一册）。国家的重大事变或时事新闻，往往也要几经辗转才能零星传入封闭的川人之耳。如黄英的《四川利害论》写道：“津沪翻译之书，闽粤视为陈言者，而蜀士始得一睹；交涉奇变之事，湘鄂传及妇孺者，而蜀士未之译闻”。当时的四川人，思想观念及行为方式上普遍表现出典型的闭关自守和一概排外倾向：“蜀中士民谈及洋务，往往相互诋排，多方阻扰，以为变祖制而学外夷，且以夺吾穷民之利，譬当局为丧心病狂，故创办难，集股尤难矣。诚由蜀士僻居西陲，闭关自守……风气所以不开也”（徐昱《创办煤油以存利权保蜀境论》，《蜀学报》第九册）。在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四川曾经出现过重庆教案、成都教案以

及以余栋臣起义等一系列反洋教斗争。但当时的四川人，一般“自童蒙入学未尝知世界，未尝知五洲八星，未尝知格致诸学”，见外国人则“嫉之、鄙之，诟之曰洋人，哂之曰西士”，视“西学”为“邪说”，贬近现代科学技术为“奇技淫巧”（王荣懋《统筹蜀藏全局论》，《蜀学报》第三册）。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全国废除了科举制度，四川大力推行“新学”普通教育的中、小学堂以及师范学堂、法政学堂、农政学堂、工业学堂等各种高等学堂应运而生。四川的文人士子，也才纷纷改弦易张，“将圣经贤传，唐诗晋字，皆束之高阁，士风为之一变”。而“对于习八股、考功名，便没有多大的兴趣”（吴玉章《辛亥革命》）。1907年，四川已有各类新式学堂7,775所，居全国第二位；在校学生达44.2万人，跃居全国之首。许多青年学子通过“新学”的学习，思想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不少人毅然突破传统封建文化的桎梏而走上了借鉴“西学”的道路，出国游学、留学的四川学子大增。光绪二十九年（1903）至三十二年（1906）4年间，成都相继成立了东文学堂、游学预备学堂，专门为留日学生补习日语，几年间东渡日本的学生达245人。在科举、旧学体制的废除瓦解与新学日兴、西学东渐的相互作用下，四川近代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开始崛起。例如“成都言新学之最先者”吴虞、四川保路同志会干事长颜楷、无产阶级革命家吴玉章、实业维新派人物周孝怀、樊孔周，立宪派代表蒲殿俊、萧湘、罗纶等。他们“以开民智为第一义”，把开通风气、宣传启蒙作为改良社会的首要任务，在各地设立学会、兴办学堂，不仅著书立说而“大讲新学”，并且还积极创立宣传新学、西学的《时务报》、《蜀学报》等，使之“畅行蜀中”。连一些旧时书坊（如成都著名的“志古堂”）也“趁时逐势，大卖新书”（《蜀学报章程》，《蜀学报》第一册）。在此期间，四川出现了新学朋兴而“民气大开”的新局面。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以及新兴资产阶级随之掀起的维新改良运动，使四川民众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也逐渐有所改变。实业维新的社会改良思潮，荡涤着川人“重农轻商”、“农本商末”的旧观念（1907年，成都商务总会成立，至1911年，川省商会达98个，数量居全国第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谋生与发展的希望由土地而转向市场，由乡村而转向城市。在一些通商口岸和开放城市（如重庆、巴县），轻商意识逐渐为重商意识所取代，儒家“重义轻

利”的传统观念受到了近代功利主义价值观的激烈挑战。逐渐，西方文明在四川官僚、士绅阶层的心目中已不再全是异己的“夷狄”之物，曾经被视为“奇技淫巧”的近现代科学技术，也不断应用于新兴的民族工业、频频出现于城市市民的社会生活之中（1904年，成都铁路总公司成立，1908年，周孝怀创办了惠昌火柴公司，1909年，樊孔周集股成立了成都第一个电灯公司）。同时，“移风易俗”也正式纳入官方社会改良的重要议事日程而广向民间推行，不仅许多封建传统礼仪渐渐被“文明礼仪”所替代，而且诸如迎神赛会、求签问卜、风水厚葬、蓄婢纳妾、卖淫嫖妓、吸食鸦片等恶俗陋习也受到限制或取缔。

可是，四川与中国东南部沿江、沿海地区相比，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先天不足，思想文化方面又得时代风气为最晚，加之四川的新知识群体大多是从传统的旧知识分子转化而来，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仍难以从根本上摆脱封建思想文化的束缚。所以在“新学”与“旧学”或“西学”与“国学”的冲撞、融合过程中，难免表现出左右摇摆的幼稚病，在“变法”与“立宪”的政治变革中，大多也局限于封建“保皇”立场，明显地流露出调和折衷的不彻底性。

三、活跃的四川戏

班科社

马克思 1875 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

与中国东南沿海、沿江地区相比较，四川半殖民化半封建化的进程迟缓了三四十年，政治经济方面的变化相对滞后，思想文化方面的变革相对落伍。可

是，作为民间艺术的四川戏曲，却因此而不仅获得了持续繁荣兴盛的机会，并且日渐呈现出愈加活跃的趋势。

（一）持续繁荣的四川戏班

前面谈到，随着清代 140 余年“移民填川”而流汇巴蜀的戏曲诸腔，已经是比较成熟而驰名全国的戏曲剧种。这些声腔剧种入川的意义，在于通过四川生存主体的大幅度变换从根本上更新了“四川戏”的内容，渐而与中国东部戏曲的发展进程接轨，迈上了“戏曲化”的台阶。在移民高潮迭起的乾嘉时期，由于四川人民处于五方杂处、各尚其俗、错用乡语而各演其家乡戏的生存状态，四川戏曲也还处于“诸腔杂呈”、“花雅争胜”的格局。但道光以后，四川人口、政治、经济持续发展的社会环境，不仅为传统封建文化的传播与衍生提供了肥沃土壤，同时也为在此基础上落户繁衍的诸腔剧种提供了新时空“四川化”衍变的条件。光绪年间，四川戏曲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引领下，已呈现出商业化、城市化、同一化的走势：戏班为了自身的发展，已不再局限于农村乡镇的节日庆典或庙会祭祀等娱演活动；班主为了盈利，不能不高价招录名伶、添置服装道具以扩充实力，把目光投向大、中城市那些更加广阔、更加集中的文化市场；伶人为了生存，也不能不打破家班、师承、声腔、行当等种种传统关系的限制，渐而通过社会化的“两合班”、“三合班”的组班方式及“两下锅”、“三下锅”的声腔兼唱形式来获取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初步统计，清雍正至宣统的 180 多年间，四川知名戏班共约 80 个。这些戏班在道光年间日渐兴盛起来，咸丰、同治年间已蔚为大观，而光绪年间四川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化社会以后，不仅数量大增，而且商业化、城市化、同一化的趋势也很明显：

清雍正二年至宣统年间四川戏班活动概况一

览

戏班名称	创办年代	主唱声
腔	活动地区	备 注

腔	老庆华班	雍正二年 泸州、成都	高 (1724 —1894)
腔	鹤龄班	乾隆四十六年 泸州	高 (1781 — 1898)
腔	燕春班	道光年间 遂宁、合州	高 (1821 —1850)
琴	太洪班	道光年间 南充、重庆、成都	弹戏、胡
琴	义泰班 川北、重庆	道光年间	昆腔、弹戏、胡
琴	金玉班	道光年间 川北、成都	弹戏、胡
腔	全胜班	咸丰二年 泸县	高
腔	新全胜班	咸丰十一年 泸州	高
腔	文星班	咸丰年间 川北、成都	弹戏、高 (1851 —1861)
琴	泰和班	咸丰年间 重庆	胡
琴	毕胜班	咸丰年间 涪陵、重庆	弹戏、胡

详	吉祥班	咸丰年间 涪陵、重庆	不
腔	大名班	咸丰年间 资阳、自贡	高
戏	玉泉班	丰年间 川北	弹
腔	艳春班	咸丰年间 万县、重庆	高
腔	富春班	咸丰年间 自贡、重庆	高
戏	庆泰班	咸丰年间 川北	弹
戏	祥泰班	咸丰年间 川北	弹
腔 于乾隆初年)	舒颐班	咸丰年间 成都	昆 (另说创建
戏	宝和班	同治年间 江油	弹
戏	聚瑞班	同治年间 川北	弹
戏	小太顺班	同治年间 川北	弹

戏	明盛班	同治年间	弹
		绵阳	
腔	文华班	同治年间	高
		自贡	
琴	瑞华班	同治光绪年间	高腔、胡
		成都、金堂	(另说 1893 年创办)
腔	宴春班	同治光绪年间	高
		资阳	
戏	洪顺班	同治光绪年间	弹
		绵阳	
琴	金华班	同治光绪年间	胡
		成都	
详	同庆班	光绪初年	不
		成都	
琴	庆泰班	光绪初年	弹戏、胡
	川北		
详	荣华班	光绪初年	不
		成都	
详	天麟班	光绪初年	不
		成都	
腔	隆盛班	光绪初年	高
		宜宾	

腔	金泰班	光绪初年 自贡	高
	舒泰班	光绪初年 自贡	高
	贵林班	光绪初年 自贡	高
腔 组)	庆华班	光绪年间 成都	高 (老庆华班解体后重
详	聚庆班	光绪年间 蒲江	不
详 市)	风麟班	光绪年间 灌县	不 (即今都江堰
详	兴堂班	光绪年间 蒲江	不
腔	三寿班	光绪年间 重庆	高
详	顺宁班	光绪年间 雅安	不
戏	义寿班	光绪年间 南充	弹
琴	查师爷班	光绪年间 川北、重庆	弹戏、胡

琴	魁胜班	光绪年间	弹戏、胡
		川北	
戏	泰鸿班	光绪四年	弹
		岳池	
腔	凤仪班	光绪十二年	高
		自贡	
腔	翠华班	光绪十三年	高
		成都	
戏	老文华班	光绪十七年	高腔、弹
		绵阳	
详	广和班	光绪十九年	不
		梓潼、成都	
琴	三太班	光绪二十年	弹戏、胡
		涪陵	
腔	宾乐班	光绪二十年	高
		成都	
详	金竺班	光绪二十年	不
		成都	
详	绚春班	光绪二十六年	不
		梓潼	
腔	翠华班	光绪二十七年	高
		成都	

腔	宴乐班	光绪二十八年 成都	高
腔	昆玉班	光绪二十八年 简阳	高
详	级升班	光绪二十九年 成都	不
详	洋溢班	光绪三十年 射洪	不
腔	明珠班	光绪三十年 成都	弹戏、高
腔	长乐班	光绪三十二年 成都	高 (原名宾乐班)
详	大颐班	光绪三十四年 雅安	不
腔	怡乐班	光绪三十四年 成都	高 (亦作颐乐班)
腔	桂春班	光绪三十四年 成都	高
腔	彩华班	光绪三十四年 成都	高
详	吉祥大顺班	光绪三十四年 双流	不

腔	玉华班	光绪三十四年 资中	高 (亦作裕华班)
详	明伦班	宣统年间 彭县	不
详	文化班	宣统年间 成都	不 (园吴碧澄新组)
戏 班”)	福盛班	宣统年间 成都	弹 (道光十八年有“福升
详	春林班	宣统年间 成都	不
详	亨义班	宣统二年 绵阳	不
调	玉山灯班	不详 阆中	灯 (班主徐玉山)
调	苍溪灯班	不详 苍溪	灯 (班主王仕富)
调	杜家灯班	不详 南部	灯 (班主杜南楼)

(二) 风格不同的“四条河道”

道光以后的四川戏曲戏班，渐遍布四川省内各地。一般是以中、小城市为中心，巡回演出于周边乡镇的节日庆典、神会庙会、集市贸易等活动之中。这种商业化、城市化、同一化的衍变态势，已突破乾嘉时期各省会馆、庙堂的演

出范围，具有了更加社会化、市场化的时代特征。此一时期四川的戏曲诸腔剧种，在“两合班”、“三合班”的组班生产方式及“两下锅”、“三下锅”的声腔演唱形式中，也处于一方面被解构，另一方面被重组的新旧交替的混沌状态。所以当时的四川人，既不以“声腔”来区分戏班，也不以“剧种”来区分戏班，而是以戏曲的承传载体戏班直接称呼其为某某班（既不沿用昆山腔、弋阳腔、西秦腔等原来的声腔称谓，也未将演唱各种声腔的戏班都统称为“川剧戏班”）。并按戏班流行地域、常演剧目、主唱声腔、表演风格等方面的不同，习惯地将四川戏曲统分为川西坝、资阳河、川北河、下川东“四条河道”（有人将“河道”视为“流派”。其实，“河”大概取“流动不息”之意，“道”大概取“流布地域”之意）。其流布范围与主要特点大致如下：

1、川西坝。川西坝又称“西坝”、“上坝”或“府河”、“上河道”。川西坝以四川省城成都为中心而向南北延伸，故亦分南、北二路。南路包括郫县、温江、崇庆、邛崃、蒲江、灌县（今都江堰市）大邑等县；北路包括绵阳、绵竹、什邡、广汉等县。光绪年间，川西坝活动的著名班社主要有庆华班、瑞华班、宾乐班（后改名长乐班）、翠华班、宴乐班、桂春班、彩华班等。常演剧目如《情天侠》、《蟠龙剑》、《龙舟会》、《铁龙山》、《酒楼晒衣》、《金钗钿》、《风筝误》、《三击掌》、《武家坡》、《青梅配》、《勾践回国》、《九人头》等。川西坝戏班以阵容齐整、台风严谨、表演细腻、唱腔隽永并擅长演出“三国戏”、“列国戏”著称。先以唱高腔、灯戏为主。光绪二十年（1894年），川北专唱“丝弦”的“太洪班”赴成都演出，并长期巡回于温江、郫县、新都、灌县、崇庆（今崇州市）、广汉、新津、双流、华阳、金堂一带。因此时被视为“国剧”的皮黄腔剧种京剧在成都已颇有影响，不少戏班亦追随时尚而渐转唱胡琴腔为主。著名剧作家黄吉安的《柴市节》、《江油关》、《青陵台》等“黄本”，即多用胡琴腔演唱。川西坝的胡琴腔亦因此被视为“川胡琴”的“正宗”，并被称为“省调”、“坝调”。为了适应城市剧场（茶园）演出以及市民观众的审美需求，川西坝的著名鼓师李升廷（1844~1905）、杨吉廷（1858~1918）、蓝少云（1871~1955）、唐德彝（1879~1946）等，率先将“大锣大鼓”改小并陆续创编出一些比较悦耳的“花锣鼓”牌子。川西坝戏班的不少名艺人，曾参加清末四川劝业道周孝怀主

持的成都“戏曲改良公会”活动，继而又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联合自组成戏曲进步团体“三庆会”剧社，成为了创建川剧剧种的一代先驱。

2、资阳河。资阳河在地域上指以自贡为中心的沱江流域，包括宜宾、泸州、内江、资中、资阳、富顺、自贡、威远、荣县等地。光绪年间，阳县（今资阳）已出现较大规模的戏曲演出活动。阳县的“城隍会”，每年都要集资举行盛大演出活动，各地戏班纷纷闻风而至。在其影响下，富顺、荣县和自贡等地的“城隍会”也争相仿效。在阳县“会戏”成风的同时，自贡又出现“品仙台”竞演活动。演出成功者被评为“戏中仙”（即戏曲界之“上品”）。自贡还有“老郎会”，每年腊月戏班扎冬班演出时，除有本地名角登台外，还要邀请外地名角集中演出三天。“城隍会”、“品仙台”、“老郎会”等活动是形成资阳河特点的重要因素。自贡地区的川盐驰名中外，地方富裕，故有庙会多、名伶多、观众多的传统。咸丰三年至光绪三年（1853—1877）“川盐济楚”期间，自贡盐商大都乘机垄断而获得厚利，成为富翁者不少。由于资阳河一带产业兴旺、经济发达，不少著名戏班伶人常常活动于此。著名戏班如大名班、裕华班、富春班、凤仪班、舒泰班、贵林班等。资阳河以唱高腔戏为主，常演剧目包括“五袍”、“四柱”、“江湖十八本”以及《南华堂》、《玉蜻蜓》、《目连传》、《孟丽君》和一些带有“楼”、“院”、“配”名目的剧目，十分丰富。资阳河演出的高腔戏非常讲究表演的细腻生动与伴奏乐器的紧密配合。尤其是帮腔、锣鼓套打、唱（行称“帮、打、唱”）的结合方面颇具特色。资阳河的打击乐特别强调锣鼓套打的气势及韵味，曾有过享誉全川的著名鼓师彭华廷（1866～1943）、左青云（1879～1942）、刘汉章（1886～1979）等。他们的精湛技艺，对后来统一诸腔节奏的川剧打击乐艺术风格的影响较大。

3、川北河。川北河以南充、阆中为中心，包括渠河、巴河、涪江、遂宁河两岸的西充、三台、遂宁、渠县、达县、蓬溪、阆中等县一带。由于川北与陕西交界，早有秦腔、渭南梆子等传入川北城乡，所以川北河的戏班多以唱弹戏为主。川北河的著名班社如道光年间的太洪班、义泰班，同治年间的庆泰班、祥泰班及以后的小太顺班、金玉班、聚瑞班、明珠班等。这些戏班以演出“本头戏”居多，高腔戏如《黄金印》、《琵琶记》、《班超》、《红梅记》

四大本，弹戏如《春秋配》、《梅绛裘》、《苦节传》、《花田错》四小本。因川北地区曾是三国英雄的古战场，所以“三国戏”也不乏其例。同时，川北河的阆中、苍溪、南部、盐亭、剑阁、昭化、江油、西充、南充、仪陇、巴中、广安等地，还十分流行富有本地区浓郁地方生活气息的民间灯戏。川北河的戏班以唱腔不折不扣、唱得饱满而闻名于世。但讲、唱多带川北地方土音，如“牛”、“刘”不分都读作“liu”，“黄”读作“fang”而“房”读作“huang”。

4、下川东。下川东以重庆为中心，包括重庆市市郊及涪陵、万县一带。由于重庆既是嘉陵江与长江的汇合处，又是四川与湖北、贵州两省往来的枢纽地，因此下川东戏班艺人的唱腔则具有昆、高、胡、弹、灯、吹兼收并蓄而富于变化的特点。咸丰年间，下川东一带的著名戏班如擅长胡琴的泰和班、擅长弹戏的义泰班、擅长高腔的艳春班与富春班等。这些戏班戏路广而唱腔颇多新声。光绪年间，北京的京剧、陕西的秦腔、湖北的汉剧常到重庆一带演出。受其影响，下川东戏班艺人的唱腔也就渐渐形成了“川夹京、川夹陕、川夹汉”的风格特色。

川西坝、资阳河、川北河、下川东“四条河道”的形成及其流变态势，既体现了戏曲总体“大一统”主体精神及追求和谐、整一审美理想的普遍性，又显示出地方戏曲因主体、因时间、因地域相对不同而异彩纷呈的特殊性。因而也可以说，清代随着“移民填川”而兼容昆、高、胡、弹、灯、吹几种声腔而日趋川化的“四川戏”，也就是中国近代戏曲“全国化”与“地方化”辩证统一演进的一个分支或一个缩影。而19、20世纪之交，四川滞后的政治经济、落伍的思想文化、活跃的戏曲戏班等背景条件与全国相同的普遍性和相异的特殊性，也就是四川戏孕育“川剧”个体生命的内在基因。

（三）方兴未艾的科班科社

从马克思主义“全面的社会生产”及“艺术生产”理论看，以戏曲为生产对象的四川戏班伶人，主要是为了适应和满足本地区当时观众的欣赏要求和精神消费而存在。这种创造主体与欣赏主体之间供求关系的一致性，是驱动四川戏曲社会化全面生产（戏曲艺术的生产、戏曲伶人自身的生产、戏曲观众的

生产)并走向商业化、城市化、同一化的原动力。戏班如要发展,不能不有偿地服务于广大观众;伶人如要生存,不能不增强竞争意识,进而将个别性的师徒承传制扩展为集体性的科班科社培训制,在不断进行艺术生产的同时,通过更多、更好的艺术人才的培养来扩大自身的再生产。光绪年间,四川戏班伶人以农村乡镇作为培养人才而向大、中城市进发的基地,科班、科社的建立此起彼伏,呈现出“无科不成班”的方兴未艾之势。例如绵州的彭小山科班,隆昌的三字科班、臣字科班,西充的念临科社,南充的祥泰科社、怀宁科社,射洪的桂华科社,泸州的志字科社,罗江的玉泉科社等。现择其影响较大者简介如下:

1、彭小山科班。同治、光绪年间在绵州永定场起班,班主彭小山,教师有其子彭玉章等。清末时有影响的科生如安国兴、唐老四、唐老幺、唐开金、仁开阳、赵保儿等。该班大致于民国初年解散。

2、三字科班。又名“名盛科班”,为资阳河著名戏班大名班的附设科班,光绪四年(1878年)创办于隆昌县双凤驿吉祥寺,主要教师有岳春、萧遐亭、罗开堂等。科班要求学生“能文”、“通经”、“善讽”。其《班训》称:“亘古优伶,为时世龟鉴,寓教于乐,寓庄于谐。非博洽,难明辨;不聪颖,莫能达;无胆识,则讳言。宋之袁三者,蜀伶之楷模也,吾侪其勉旃”(《内江地区戏曲志》)。因师徒皆以宋代“袁三”为楷模,故该科班亦称“三字科班”,科生艺名亦均带一个“三”字。科班规定:(1)科生必须练好基功和唱腔;(2)通晓一般,精通一行;(3)开设历史、文化课,科生要具有一定文化、历史知识。并实行因材施教,因人排戏。由于训练严格有方,在较短时间内即培养出一批颇有影响的人才。如名伶蔡三品、傅三乾、刘三凤、唐三春、李三刚、张三喜、王三红、石三龙、林三官、彭三廷、王三槐、段三廷等。

3、臣字科班。又名“天乐科班”(相传该班化妆演出之初逢天落大雨,遂谐“天落”之音取名“天乐”以寓吉祥),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开办于隆昌县双凤驿吉祥寺。此班由当地士绅刘祥武出资,聘请谢海潮、傅三乾、胡至、蒲松年、蒲寿山为教师,由班主刘子峰招收近50名孤儿组成。此班生徒艺名多带一个“臣”字,如曹俊臣、段斌臣、王京臣、罗云臣、李瑞臣、罗

金臣、陈书臣等。民国初年，该班常在内江、自贡一带演出，不久解体，主要演员多流入富春班。

4、念临科社。光绪三十年（1904年）创办于西充县槐树乡西禅寺，主办人为袍哥大爷何志庭。科社招收本地9~13岁儿童约40名进行培训，分行当教学，三个月后便登台唱戏。科社规定早上练基本功、练嗓，上午学习武功、把子，下午学习唱腔，晚上学习身法、台步和程式套子。经过四年边学习边演出的培训，出科的知名生徒有曹国安、苏良清、赵湘云、吴绍志、梁桂英、梁金山、陈林武、陈达山、杨荣丰、卜元志等。

5、祥泰科社。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创办于南充县舞凤乡板桥子（今南充石油学院附近），由杨金山（又名杨六六，本科社创办人）、贾雨山等任教。出科的知名艺伶如周海滨、黄泰孚、何泰保、萧泰和、任泰义等。

6、怀宁科社。又名“晓字科社”，宣统三年（1911年）由杨金山创建于南充县城郊舞凤山麓。杨金山兼任教师，执教者还有刘怀叙、罗忠武等。该科社科生艺名多带一个“晓”字，如吴晓雷、黄晓富、杨晓光，萧晓康、邓晓舟、黄晓贵、邱晓秋、吴晓斌、唐晓怀、官晓康、刘晓平、晓雪、刘晓杨等。此科社于民国三年（1914年）由合川县萧家场萧八爷接办，民国五年（1916年）解散。